



【文化杂谈】

我为什么要写《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

□钱理群

本文系钱理群为自己的《知识分子精神史》作的总序。继《1948：天地玄黄》和《我的精神自传》后，三部曲的终卷《岁月沧桑》已于日前出版。钱理群选择沈从文、梁漱溟、赵树理、废名、王瑶、郭小川、邵燕祥等人，以他们在1949年至上世纪70年代的生命历程为观照对象，通过大量的新材料，深入解读他们在时代大转型中的投入、挫折、困惑和坚守。

《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终于完稿，送到读者手中，我特别欣慰，并有如释重负之感。从1996年写出第一部《1948：天地玄黄》，到2007年完成第三部《我的精神自传》，第二部《岁月沧桑》又于2015年收笔，前后将近二十年。在这二十年间，外部世界相当喧闹，中国与全球都发生了不少预料不到的事情，而我自己的生命与学术，却逐渐沉潜下来，沉到历史与现实的深处、自我心灵的深处，写出了我最想写的东西。

我多次说过，我的学术研究带有强烈的自救自赎的性质，“所有的学术探讨，对外部世界历史与现实的追问，都最后归结为自我内心的逼问，对于自我存在的历史性分析和本体性追问：我是谁？我何以存在与言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终于走上学者之路的时候，我最想追问的，也就是构成了从事学术研究的内在动力的，就是我想弄清楚：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怎样接受“改造”的？我被“改造”成了什么样子，坠入了怎样的精神深渊？我该如何自救？如何做堂堂正正的“人”，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活得像个样子？我到哪里去寻找精神资源？我知道，这不仅是我个人的问题，而且是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的问题。要真正弄清楚自己，就必须对知识分子的精神历史作一番清理和总结。因此，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和朋友一起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时，我自己最为倾心的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我知道，这才是属于我的研究领域、我的魂之所系。

因此，从一开始，无论是研究鲁迅、周作人，研究曹禺，还是研究“堂吉诃德

与哈姆雷特的东移”，都是在探讨他们的精神发展史，试图从中寻找精神资源，总结历史教训。到1997年，就提出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系列研究设想”。预计写七本书：“一，上世纪二十年代：大学里的知识分子——以北京为中心；二，上世纪三十年代：文学市场中的知识分子——以上海为中心；三，战争流亡中的知识分子——以西南联大、鲁艺（抗大）为中心；四，一个特殊的年代（1948年）历史转折中的知识分子——从南京到北京的中心转移；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体制下的知识分子；六，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时代的知识分子；七，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处于历史交汇点的知识分子——中心失落以后的无序状态。”

这个计划显然过于庞大，也过于完整了，具体操作起来，有相当的难度，就需要作一些调整。最后，就决定将研究的中心集中到共和国历史时期，即书写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这自然与我的“共和国情结”直接相关。可以说“当代中国”才是我真正兴趣所在。历史的研究也是指向当代的，我的鲁迅研究的自我定位就是把鲁迅资源转化为当代思想文化教育资源，充当连接“鲁迅”与“当代中国”的桥梁。研究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史也更能体现我的自我反省、反思的意图。

于是，就有了“知识分子精神史”三部曲的写作。这同时是我的“共和国历史研究”的重要部分。此书一出，我的共和国研究也就基本画上句号了。

这三部曲是自有一个“起承转合”的结构的。

《1948：天地玄黄》，写共和国建立前玄黄未定之时，知识分子对新中国的想象与

选择，是其“起”，未来中国的许多基本命题（观念、体制、心理、话语方式等）都已孕育其中。《岁月沧桑》写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是一个“承转”即展开的过程，其中的核心是知识分子的“改造”与“坚守”。而以《我的精神自传》作“合”，则是煞费苦心的。不仅有操作层面的考虑：要写后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选择，会涉及许多还健在的知识分子，不如就写自己；更有内在的原因：其实，我在讲知识分子的故事时，自己已经隐含其间，我是以自己的历史与现实的感受、生命体验去观察、描写的，就需要最后现身，用自己在陷入“绝地”以后的反省、反思来为整个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作一个“总合”，即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以便“守望”住知识分子的本分。因此，我十分看重在书中所提出的六大问题：“知识分子自我独立性与主体性问题”、“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关系问题”、“关于启蒙主义的反思”、“关于理想主义的反思”、“关于思想与行动关系问题”、“自然人性论与个人主义问题”，这都是我从知识分子精神史的考察、研究里提炼出的知识分子基本思想、精神命题，这里既有我们当年落入改造深渊的陷阱，更有历经沧桑又必须坚守的东西。这背后可能还有相当大的理论提升的空间。我只能提出初步的思考，借此对自己的一生作个交代，即“多少明白了一点以后再去见上帝”。同时，也是我最想留给年轻一代和后人的思想结晶：我们只能“守望”，而他们更应该有新的开拓。这就是我近年不断说的话：“在做完了可以、可能做的一切之后，将我的祝福送给年轻的朋友。”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垃圾』与国民素质

【域外走笔】

□吕周聚

第一次来到日本，走在东京的大街小巷中，看着马路两边的高楼大厦，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一切都很陌生，一切都很新鲜。低头看看马路，路面非常干净，看不见飞舞的塑料袋、废纸，也看不到其他垃圾，甚至路边连个垃圾桶也看不到。他们为什么连个垃圾桶也没有呢？人们的垃圾往哪里扔呢？这是我非常好奇的一个问题。

在这儿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对日本人的垃圾处理方式有了了解。我入住的东京大学国际公寓是专门给国际访问学者和国际留学生提供住宿的地方。入住的第一天，公寓的管理人员领着我看房子，在一一交待了房间里的各种设施后，又特地交待了进门后鞋柜上放的两种不同颜色的塑料袋，告诉我黄色的袋子用来装塑料垃圾，红色的袋子用来装纸张等易燃烧的垃圾。然后领着我来到楼下门外一个小平房，打开门，告诉我将垃圾放到这个屋子里，且要分类来放：罐子、瓶子、塑料、纸张、生活垃圾，分得非常细，每周会有专门的车辆来进行收集处理。日本人已经养成了垃圾分类的习惯，这样做，既环保卫生，又能够废物利用。日本人有一个好习惯，在外出时随身携带一个塑料袋或纸袋，如果有了垃圾便放入这个袋子中，而不是随手扔在某处。正因如此，在日本的大街小巷很难见到一个垃圾桶，但路面上却非常干净。

日本比中国早一个小时的时差，我在这儿醒得也特别早。清晨，我来到马路上散步，清晨的阳光透过白云投射到地面上，给人一种清新润泽的感觉，空气中浮动着一种沁人的清香。马路上行人稀少，偶尔看到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一会儿骑一会儿下，在路边的草丛、树丛中寻找什么东西，走近了一看，是一位没穿工作服的环卫人员，他一手提一个塑料袋，一手拿一只长长的铁钳子，将遗弃在路边的废纸、塑料袋等垃圾捡到袋子中去。打眼望去，他那不大的袋子中收获有限。后来，在其他地方也见过日本的环卫工人，他们身穿工作服，手里用的是比较原始的打扫工具——扫帚，打扫的主要是从树上掉下来的黄叶子、枯树枝。

日本是一个岛国，其自然资源非常有限，因此日本人就养成了一种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使得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注意节俭、杜绝浪费。这种忧患意识成为他们的一种精神气质和国民素质。而我们向来以地大物博而自豪，实际上如果按人口比例来算，中国在世界上真算不上地大物博。“地大物博”固然增长了我们的民族自豪感，但也给我们带来一种错觉，于是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浪费严重，产生了大量垃圾，不仅浪费了物质资源，而且严重破坏了生存环境。近些年，我们对垃圾的处理虽也有了很大改进，但在现实生活中仍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们常常看到路边虽有垃圾桶，但垃圾桶周围垃圾遍地；垃圾桶虽然有分类标志，但不同分类的垃圾桶里的垃圾却并没有分类。这说明，在垃圾分类和处理方面，我们的国民意识仍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实际上，物质与精神密切相关，在如何看待处理物质垃圾上往往能够看出一个人的精神面貌与素质修养。日本人在管理好物质垃圾的同时，也能够管控好精神垃圾，因此，无论是在公共汽车、地铁里，还是在其他公共场合，日本人很少大声喧哗，也很少有不文明的行为。

古人云，仓禀实而知礼节，意思是老百姓家里富有了，就会讲文明、有礼节。可见，一个人是否有礼节，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是否富有是密切相关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日益富强，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许多有了钱的中国人或者在国内旅游，或者走出国门旅游，有关这方面的新闻报道随处可见。但在这些新闻中，我们时常会看到一些负面的事件，中国游客在国外公共场合大声喧哗、乱扔垃圾、随地吐痰甚至吵架，更有甚者在机场打骂公务人员。从这些负面新闻中，我们看到在物质上富有了的国人在精神文明上仍有待提高。

看到这些新闻，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向来以文明著称的我们何以会如此？是否有其他的原因在起作用呢？如果静下心来理性地看待这一问题，则不难发现其事出有因。通过小小的“垃圾”，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的素质修养，同样也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修养。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养成不乱扔垃圾的好习惯，提高自己的素质修养，那么我们国家的国民素质修养也就会在整体上有很大的提高。

（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